

糟糕的数据

非洲发展数据的
误导性及对策研究

How We Are Misled by African Development
Statis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英] 莫顿·杰尔文 ◎ 著
于超 ◎ 译

比尔·盖茨

年度好书
隆重推荐

Poor Numbers

经济学家杰尔文花了4年时间研究
非洲各国的GDP，
证实许多我们以为
准确的数据其实错得离谱。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糟糕 的数据

非洲发展数据
的误导性及对策研究

How We Are Misled by African Development
Statis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英] 莫顿·杰尔文 ◎ 著
于超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糟糕的数据 / (英) 杰尔文著 ; 于超译 . -- 武汉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5.12
ISBN 978-7-5352-7800-5

I . ①糟… II . ①杰… ②于… III . ①国内生产总值—研究—非洲 IV . ① F2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800 号

Poor Numbers: How We Are Misled by African Development Statis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By Morten Jerve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3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Poor Numbers 糟糕的数据

编 著 : [英] 莫顿·杰尔文 著 于超 译
责任编辑 : 刘 虹 曾 菡
装帧设计 : 胡 博

出版发行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3-14 座)

电 话 : 027-87679468

邮 编 : 430070

网 址 : <http://www.hbstp.com.cn>

印 刷 : 武汉市金港印刷有限公司

邮 编 : 430040

开 本 : 1/16

印 张 : 16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9.00 元





前言

Preface

他们到底是如何得出的这些数字？我希望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07年，为了完成我的经济史博士论文，我前往了赞比亚进行实地调查。我了解这些非洲国家是如何得出的国民收入估计值。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位于卢萨卡(Lusaka)的中央统计局(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几乎处于一个废弃的状态。出行用的汽车出现了故障而需要修理，大部分办公室都是一片漆黑，电脑不是遗失就是老化，因此原计划的农作物调查也被延迟了。整个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只有三名员工，在我访问期间，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固定值守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十年以前的国民收入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在图书馆里也没有出版物或者记录能够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进行过任何统计活动。

卢萨卡(Lusaka)是非洲东南部内陆国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位于赞比亚的东南部，海拔约1400米的高原之上。由于赞比亚系一盛产铜矿的内陆国，卢萨卡有铁路通往邻国坦桑尼亚以运铜出口，因而有“铜都”之誉。

针对用于核算赞比亚国民收入的数据和方法所做的最近一次修订还

早在 1994 年。当时编制了一份关于统计方法的简短报告,但并未发表,这份报告只是作为国家统计人员的一本参考手册在统计部门内部进行传阅。这也反映了赞比亚国民收入统计的现实状况。令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他们不仅缺乏基本数据,而且缺乏基本的统计方法。只在政府财政和铜行业方面具有定期和可靠的数据。整个农业部门负责研究 8 种农产品的收成趋势预测。而至于其他的经济领域则实在是没有可用数据。在统计中,假设建筑业与水泥生产和进口有着相同的增长速度。假设零售业、批发业和运输业都与农业和铜产业有着相同的增长速度,并假设商业服务业与贸易和运输业有着相同的增长速度。

在 2010 年,当我再次来到赞比亚时,我发现只有一个人在编制国民账户。“如果我不在这里了会怎样?”他的问题不是假设,而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不久前,他还曾经有过一个同事,但是为了进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工作,这个人也被从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调走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缺少人手对工业部门进行统计以及缺乏公共财政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国民经济核算部门的唯一一位统计人员还要负责这些数据的统计工作。

当我问起关于赞比亚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数据的质量时,一位北欧某国大使馆的经济顾问告诉我,“情况非常糟糕”。这位经济顾问首先提出不要在我的报告中透露他的名字,然后他接着说道,迫切需要对统计部门进行

改革。每日津贴意味着,统计人员在现场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时,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但当他们在办公室编制估计值和报告时,却只能获得非常少的收入。根据我的消息提供者所说,这就意味着,统计部门总是找各种理由希望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所以他们总是声称需要更多的数据,需要更多的实地调查,并且需要从其他部门调人来参与数据收集工作。

来自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一位代表在前一天告诉我说“捐助者不会理解,因为他们都在围绕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进行工作”。新的发展议程是针对这些目标的,可用的资源都被用在了为编制社会指标报告而进行的数据收集方面。这一看法也说明了现在与以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往都是紧紧地围绕经济增长。目前,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变化的物理指标方面的数据所分配的优先级是非常之低的。结果是,经济发展数据的可用性和可靠性都很低,并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糟糕,而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却在变得越来越好。

我和赞比亚唯一的一位编制收入和增长数据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面谈,但这次面谈时间也被缩短了,因为他告诉我,“我和英国国际发展部有一个会议。”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代表在前一天还在感叹,工作人员都被从编制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的工作岗位调离了,但他们也打算请这位国家统计人员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英国国际发展部关心的是一份由他

Poor Numbers 糟糕的数据

*How We Are Misled by African Development Statistic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非洲发展数据的误导性及对策研究

前 言

们资助的报告,这份报告需要在当年年底前完成。这份报告名为生活条件监测调查(Living Conditions Monitoring Survey),负责完成报告的部门主管已经前往日本去参加进一步的培训。现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希望这位国家统计人员来为他们完成这份报告。

这些故事说明了非洲的国家统计人员在生产收入数据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利益相关者。从2007年以来,我对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进行了走访调研,类似的轶事还有很多。我的目的在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是如何得出的这些数字?我面临的问题是超越轶事证据,并提供一个系统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它因国家而异。数字的生产过程会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并且还会涉及统计术语和技术程序方面的问题。这本书是为那些数据用户而写的,发展学者和该领域内的从业者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数字质量如何?本书也会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简而言之,这些数字是相当糟糕的。这不只是在技术上的准确性问题。随意的量化过程所产生的测量值具有非常大的误差和不确定性。这个数字游戏所处的环境很容易使所产生的数字具有危险的误导性,而这些数字却要用来制定分配稀缺资源的关键决策。国际发展参与者正在根据错误的数据做出判断。由于现有的数据非常脆弱或者他们所需要的数据根

本就不存在,所以政府无法做出明智的决策。

本书主要讨论了非洲经济发展数据的产生和使用,并展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中的所有核心问题都围绕着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衡量。这些经济活动可以用一个总量综合指标来表示,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人们经常用这个指标来对国家财富和进步进行排名和评级。在本书中提到的国家财富和进步,我所指的是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GDP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对经济活动的衡量标准,但关于这个指标的生产过程以及在有关非洲经济发展争论中的滥用,这些却是鲜为人知的。本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关于非洲国民收入核算的民族志。莎莉·恩格尔·梅利(Sally Engle Merry)为此提供了这样一个工作定义:

编写一个指标的民族志是指,研究一个指标的创立及其基本理论的历史,研究那些讨论和定义该指标术语的专家组会议和国际讨论,就指标的含义和生产过程采访专业统计人员及其他专家,研究数据收集过程,研究该指标影响决策和公众认知的方式。

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我采访了一些国家的统计部门、中央银行和捐助者代表团,并与一些同事和国家专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还收集并研究了一些公开及未公开的报告,这些报告主要是关于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本书的研究是基于对一些国家所进

行的调查访问,这些国家包括博茨瓦纳(Botswana)、加纳(Ghana)、肯尼亚(Kenya)、马拉维(Malawi)、尼日利亚(Nigeria)、坦桑尼亚(Tanzania)、乌干达(Uganda)和赞比亚(Zambia)。为了对整个非洲的概况有一个了解,我还通过电子邮件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数据。我还收集了源自不同国际机构的数据集,并对不同版本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本书对发展经济数据的不准确程度进行了一次评估,并说明了这些数据问题的政策影响,并在最后对解决办法进行了探讨。

在得出一些大致的结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注意事项。本书并不包括所有非洲国家的所有统计数据。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国民账户体系以及GDP的统计——关于这些国家经济信息的基本框架。正如前面所列出的国家所显示的,这些详细信息主要来源于英语非洲国家。在研究中,我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权衡,对于一些我在个人采访中所收集的更为丰富的信息以及我在对整个非洲大陆所进行的调查中所获得的摘要信息,我尽量减少了对这些信息的依赖。因为统计国民收入所依据的信息是大部分统计部门都会收集的信息,所以说,国民收入统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统计系统在这些国家中的运作方式。

通过研究来证明非洲统计数据的质量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的研究结果可能不会让有些人感到意外。在部分发展中国家,

这的确不是新闻，而且许多人已经接受了它的后果，并有意回避了那些由完全基于统计分析的经济发展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另一种极端情况是，一些统计人员对他们所使用数据充满信心，除非能够证明这些测量值的准确性确实存在问题，否则都不会动摇他们的信心。本书旨在通过为持不同观点的双方提供用于处理发展数据问题的工具，来弥补双方在这一观点上存在的差距。本书除了说明数据质量的重要性之外，还对非洲经济统计误差的水平、方向和原因进行了首次系统的分析。对于质量较差的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出现的时期以及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本书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于统计数据产生过程中的政治压力的重要性，本书也进一步提供了深入而细致的观点。本书还研究了数据生产者与施加压力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国际组织和国内的政治领袖）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还大胆地涉及了对最终解决办法的讨论。证明数字是错误的，证明错误的数字会误导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这些是相对容易的，而找到应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才是更加困难的。应该实行哪些改革？本书讨论了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才能改进在生产和使用统计数据方面的指导原则。对于全球标准或规范与当地情况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调整全球标准以适应当地实际情况，本书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基本的结论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需要新的基线估计，并且必须根据当地的适用性来予以实施，而不只是根据理论或政治倾向。所给出的政策建议并不应该只是为收

集数据提供更多的资金。还有必要加强统计机构作为数据提供者的合法性——承认统计机构在经济发展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是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数据提供者的重要一步,这样才能让他们为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定期和可靠的数据。

目前在使用定性方法的学者和使用定量方法的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本书希望能够弥补这种不合理的鸿沟。定量分析学者应该更仔细地倾听来自于定性分析学者的批评,相反,定性分析学者的技能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发掘数字来源的工作,并为解释这些数字提供深刻的见解。在本能地认为这些数字不可能是好的与不愿意研究它们有多么糟糕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差距。第一步就是要承认问题。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本书献给所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统计局工作的诚实而勤奋的公务人员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这本书将不会问世。他们在官僚政治和经济困难面前所表现出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我希望他们的开放性和参与意愿能够通过本书得到补偿。我的确能够意识到,本书的标题看起来似乎是对这些统计人员的公然侮辱,我为此感到抱歉。但我相信,对这个发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关注和开放性,会为这种说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数字为我们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糟糕的指引。

有一个关于非洲统计人员的开放性的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在 2010 年 2 月访问位于尼日利亚阿布贾(Abuja)的国家统计局时,他们对我的欢迎方式。当我被介绍给宣传主管时,他索性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并声音洪亮地对我说,“欢迎!”他解释说,他的部门是在做提供信息的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是一项服务。如果没有对他部门生产的数据的需求或者没有消费者的话,那么他们的产品就不会存在。他的做法和态度是有启发性的。对于那个核心问题——数据生产者和数据消费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有了答案。我们需要更清楚地思考自己要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对这些信息有什么要求。在这个特殊的知识生产函数中，在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存在着问题。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合理地处理双方的关系。

但我并非在所有机构都遇到了同样的热情。在 2007 年，可以说我被抛在了东非统计局的图书馆里。当时，这个“图书馆”只有一个房间，在地板上成堆摆放着杂乱无章的书籍，在那个周初，我被正式邀请到这里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对我有用的东西。当馆长在那个周末回来工作时，他的态度变得恶劣了，并声称这个图书馆没有可用于研究的资料。我只能表示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四年之后，在国民核算部门的帮助下，我才最终接触到了我所需要的信息。

你不能随便走进一个统计办公室就问：你们的数据统计做得有多差？统计办公室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合理地支持它的数字。在西非的一个办公室，一位官员曾向我保证，目前的 GDP 估计值既没有被低估也没有被高估。这个数字恰当地反映了国民收入水平，没有任何误差。但这位官员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我前一天与一个同事谈过），这个办公室得出的真实统计结果表明，当前的 GDP 估计值至少少计算了 40~50 个百分点。这位官员需要支持自己的办公室所生成的数字，因为她要遵守官方规定。我的做法是尽量进行开放的沟通，并询问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你是怎么得出的结

果？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告诉我需要知道的信息。其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很多关于数据生产的有趣信息只有通过我所做的这类研究才能复原。这依赖于开放的大门，并且我要感谢所有向我开放的大门。

如同将在本书中明确说明的那样，我并没有对数据传播部门一视同仁地表示我的感谢，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其数据部门。与统计部门一样，在这里也有例外。我曾与国家代表团的技术顾问和代表进行过长期而有益的对话。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他们当时正在试图拼凑出依靠这些数据的实证研究，他们有时会与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挫折。但在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比较注重维护他们所使用数字的官方有效性。世界银行的数据小组更是如此。对我的标准调查问题，他们的回答不是引用数据手册和公式，就是像大多数情况那样回答说，他们不分享这些信息。

在 2011 年 11 月，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参加了一次交流会，我要感谢所有来自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部门的与会代表们。我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要感谢全球发展中心的邀请，感谢阿兰·盖尔布（Alan Gelb）主持了会议。

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和南非统计局在南非开普敦举办过一场关于衡量非洲国家国民收入、财富、贫穷和不平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我做了一次类似的演讲。我要感谢挪威统计局的利夫·霍贝尔斯塔德·辛普森(Liv Hobbelstad Simpson)促成了这次会议,还要感谢德里克·布雷兹(Derek Blades)给出的非常有用的意见。作为对我的论文的回应,特别是对加纳向上修订 GDP 的消息的回应,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尚塔亚纳恩·德瓦拉贾(Shantayanan Devarajan)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洲的统计悲剧》的文章。虽然我不同意尚塔亚纳恩对问题特征的描述(如同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到的,问题在于基础数据的可用性,而不是汇总方法),但他勇敢地指出了自己机构的数据小组的错误做法,这为认真反思该如何衡量非洲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次会议上,我又再次见到了加纳统计局的马格努斯·埃博·邓肯(Magnus Ebo Duncan),他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从 2007 年以来,我参加了多个讨论会议并就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做了演讲,我从这些讨论和评论中受益匪浅。我曾两次到过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展示我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是 2009 年在历史系,第二次是 2011 年在非洲研究中心。我从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黛博拉·约翰斯顿(Deborah Johnston)那里学到了很多,从我的研究生时期开始,我就一直在和她讨论非洲发展的测量问题。我还要感谢俄克拉何马大学经